

为人民服务： 从提出口号到成为党的宗旨

□ 朱文通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贡献,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并长期坚持的,早已被广大人民群众、党员干部所公认。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有一个提出和发展的过程。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是如何提出来的呢?

朱德提出口号“誓为人民服

曾经有学者根据《蒋介石日记》等资料指出,为人民服务最早是由蒋介石于1937年提出来的,此说影响一度极大。根据笔者的考察,为人民服务最初是在“誓为人民服务”这一口号中被提出来的。蒋介石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一说,虽然说是已经不改自破,但是其影响至今仍然难以消除,还是不断地有人有意无意地提起。笔者曾经于2014年6月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朱德与“誓为人民服”口号》一文探讨这个问题。现存实物证明,1927年6月30日,朱德领导的中共南昌军管教导团党支部,在发给学员颁发的毕业证上,加印了“誓为人民服”字样,最早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通过多种方式(包括1939年在致张闻天的信函中),多次谈到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特别是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的演讲,深入阐发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传播。后来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给《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由此可见,为人民服务最初是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和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南昌军管教导团军队内部的一个政治口号。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大力提倡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才逐渐发展成为党的宗旨。

毛泽东关于为人民服务的系列阐述

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科学命题被正式提出来,是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毛泽东在“七大”上系统地论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七大”开幕词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还强调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和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从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朱德同志领导下的南昌军管教导团党支部提出的一个口号“誓为人民服”,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陕甘宁边区的首府,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唯一的宗旨”。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一贯高度重视和系列阐述,1945年6月11日,在“七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同时进一步要求广大党员一定要努力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可见可知,毛泽东在这里一方面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八路军的“唯一的宗旨”,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个是“唯一的宗旨”,一个是革命的“精神”,这种细微的差别显然并非偶然的疏忽所致,而

应该是有关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后做出的慎重选择和周密安排。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追悼会上的即兴演讲,于1944年9月21日在《解放日报》上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发表出来,逐渐开始在各地流传。该文在新中国成立初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才正式定名为《为人民服务》。在根据地、解放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中,《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由于短小精悍、思想深邃逐渐普及开来,在党员干部教育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后来这三篇文章被合称为“老三篇”,更是风靡天下,妇孺皆知。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根据笔者的考察,最早是胡耀邦在198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提出来的。胡耀邦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是我们必须永远坚持的宗旨。”这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宗旨第一次明确地被提出来。

1983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进一步指出:“现在,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根本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整顿作风,就是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这里既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强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种革命精神,可谓在继承中又有新发展。

198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颁布《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指出,广大中国共产党党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根本宗旨的认识”,“进行一次深入的党

的根本宗旨的教育”,“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党的根本宗旨”问题。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的宗旨,他说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要为人民做事的,要以人民为中心,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一再强调:“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句话。”“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和党史学习教育,以及“四史”学习等活动,无不是党的宗旨教育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是对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更好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征程中践行党的根本宗旨。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移动互联网以及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信息传播领域的生态与业态发生巨变。如何加快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成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要义。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强调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要义,“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创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这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提出了新的定位,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即“两办方针”)的历史经验在全媒体时代的延伸与发展。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时强调,“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办。”这一提法随后被总结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当时解放区的新闻舆论工作,报纸是党的最主要阵地,但办报对于人民群众却有较高的门槛,如何把“两办方针”落实到基层,调动人民群众办报的积极性,考验着党的新闻工作者。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江西革命根据地,黑板报、墙报、印发传单、读报、文艺演出、传唱革命歌谣等形式曾在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参加革命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传统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得以传承与发扬,至40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规定:“为了能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在可能的条件下,各地黑板报应由群众主办,政府则尽量予以帮助指导。”群众办报则包括基层党组织的墙报、壁报、黑板报等非专业的媒介。此外,报社积极开展为人民群众读报,在县区乡各基层设立通讯员,培养人民群众成为基层通讯员;同时,在编辑部常设群众工作部门,听取群众意见,反映群众问题,答疑解惑。通过上述方式将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与基层政权、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地方实际情况相结合,推动党的新闻事业深入地方基层,真正实现新闻能够指导群众的生产生活,反映群众所需所想。其背后的机制

就是党的新闻工作要结合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报纸,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社会现实的需要。革命时期“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秉持开放的姿态,由全党与全体人民群众参与办报,特别是通过各种措施鼓励群众参与办报工作。二是报纸的内容编排,努力做到与群众息息相关,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三是将办报视为党的一种工作方式,各级党组织都要有自己的报纸。“两办方针”是20世纪40年代党在发展建构符合解放区新闻宣传工作实际情况的智慧体现,延续马克思所提出的人民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落实列宁针对党的出版物所提出的“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的同时,又能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将上述理论精神进行中国化的探索与尝试,充分发挥党报改革改造党的工作的功能,让各部门可以充分利用报纸开展工作,让与人民密切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党的路线与人民路线的统一。因此,“两办方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事业中的集中概括和系统化提炼,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共领导人,结合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以及新闻工作在不同时期的实践需求,赋予了“两办方针”不同的时代内涵。中共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核心问题,为此特别重视群众路线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情况,要求“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他强调,“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其中,习近平总书记谈及新闻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时,要求在继承“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已有的丰富理论内涵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全媒体的传播环境做了进一步丰富

和发展,提出很多精辟的论述和深刻阐释,为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赋予新思想内涵。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

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人民性,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这一论述在结合新时期党的宣传工作的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对党性和人民性的内涵进行了科学准确的界定,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重申两者之间一以贯之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以及对宣传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从而进一步凸显党始终以民为本、执政为民、为民谋利的执政理念,强调宣传工作的根本在于坚持群众路线,进一步创新发展了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为具体的新闻工作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二 在传统媒体时代,党报是了解社情民意,反映群众现实需求,掌握群众脉搏,解决群众困难的主要渠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民群众媒体接触及使用习惯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新闻媒介生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何因应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全新形势,为党的国家治理工作提出全新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4月19日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

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同时要求,“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2019年1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全媒体时代“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空间,那也就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这些系列论述为新时期传统媒体更好地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创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具体的路径。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概念,丰富发展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内涵,要求传统媒体要加快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上连党心、下接民心的全媒体传播格局。这给纵深推进媒体融合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和目标,明确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全媒体融合中的角色。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了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的具体要求和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介融合的一系列讲话一脉相承,形成了目标清晰、方法具体、意见明确、内涵丰富的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贯彻执行的规划路径。

一直以来,中共领导人高度重视新闻工作,始终着眼新闻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两办方针”发展到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对其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为广大的新闻工作者贯彻执行新时期的群众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而新闻工作者要深入领会全媒体时代的群众路线,在理论的指引下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不断在实践中开创新闻工作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共成立时期的陈望道

□ 关威

陈望道(1890—1977),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人。他青少年时先在家乡求学和教书,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学。初在东京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后转中央大学学习法学,毕业获学士学位。那个时代,中国处在剧烈变革之中,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思想文化领域异常活跃。在日本的陈望道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怀着救国救民之志,潜心探求真理。他在刻苦攻读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逐步成长为社会主义者。

1919年夏,陈望道从日本回到杭州,受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经亨颐校长的聘请,任该校语文教师。当时五四运动余波未平,浙江一师的许多师生思想比较自由。陈望道与另外三位语文老师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合作进行语文教学改革,提倡白话文;同时,他们还积极宣传新思想,反对封建礼教,因而被称为“四大金刚”。受其影响,一师的进步学生施存统在1919年11月的《浙江新潮》第2期发表《非孝》一文,提出“要借此问题,煽成大火,把家庭制度根本推翻,然后从而建设一个新社会。”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反对者视为大逆不道,主张查办。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夏敬观批评查经亨颐校长,要求开除“四大金刚”等进步师生。经亨颐据理力争,不肯执行,

竟被解职。此事激怒了一师师生,他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反对撤换校长和教师。反动当局出动荷枪实弹的军警开进学校镇压师生,制造了流血事件,此即“浙江一师风潮”。

事件平息后,陈望道被迫离开一师回到家乡。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中国革命向新民主主义转变。人称“南陈北李”的陈独秀、李大钊发表一系列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引起强烈反响。陈望道积极投入宣传工作,他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翻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全文,于1920年4月在上海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受到进步舆论的热烈赞扬。陈望道还翻译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劳动运动通论》、《劳工问题的由来》等文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0年春天,应陈独秀的邀请,陈望道来到上海,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报《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注重刊载介绍马克思主义、赞扬十月革命的文章,同胡适的实用主义以及社会上其他不良思潮作坚决斗争。通过编辑《新青年》,陈望道的思想理论水平明显提高。陈望道还参与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工

作。《觉悟》副刊是邵力子主编的进步刊物,注重研究社会问题,探讨改造社会之方法,是当时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陈望道在《觉悟》副刊发表了一些文章,宣传社会改造,妇女解放等思想,反响强烈。

1920年春陈望道到上海时,上海的社会主义者正酝酿筹备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准备。陈望道一边精心编辑刊物,撰写文章,做宣传工作,一边积极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工作。他与上海的其他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邵力子、沈雁冰等人密切合作,共同探讨有关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贡献,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8月3日,《民国日报》又一副刊《妇女评论》在上海创刊,陈望道任主编。他在第1期发表“创刊宣言”,阐明本刊宗旨是“反对旧思想、旧制度,要求解放、提倡自由”。该刊存在近两年时间里,陈望道在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倡男女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妇女争取教育权、争取就业权和参政权等,对于轰轰烈烈开展的妇女解放运动起了指导和推动作用。《妇女评论》以其鲜明的特色成为妇女解放言论的重要阵地。

